

文化制度安排与经济发展

陈珺宇 张 振

经济发展是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的沃土之中的,而且社会文化制度具有不可移植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照抄别国的文化。适宜的文化制度安排,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且也是促使正式制度安排发挥作用的不可缺少的保障。

一、文化制度及其功能

制度实际上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任意两人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既可用正式的制度,也可用非正式的制度来描述。人与人契约关系中的诸种规则,尤其是非正式规则,与该社会所由以生长的文化有密切关系。按照一般的定义,文化是一代人通过教育和示范传授给下一代人知识、价值,或其他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的过程。非正式制度可以被理解为所有在正式制度无定义的情况下,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准行为。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人们面对的心理约束。

社会经济发展是深深地植根于非正式制度特别是社会文化制度的沃土之上的,文化制度不仅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提供社会发展的价值坐标,而且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终极理念。

第一,文化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强劲的动力。纵观东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与肯定,没有启蒙运动对阉割人性的神性的否弃,没有人道、理性、科学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的脚步就不会跨越中世纪人性枯萎的莽原,就不会诞生资本主义革命,更不会有市场经济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如果没有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制化的理性精神,没有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及人的价值、自由、个性的反思,就不会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观;没有“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科学评价标准,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第二,文化制度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性的价值坐标。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发展方式的一个理性的辨别选择过程。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

及评价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一个价值参照系统,用以规范和诱导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而一个合理的社会价值坐标体系的形成,需要社会文化的倡导。当个人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很低地作出理性判断,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出理性边界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风俗习性等非正式制度来走“捷径”或抄近路。文化制度所内在的与公平、公正相关的道德和伦理评价明显地有助于缩减人们在相互对立的理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

第三,文化制度安排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终极理念。多少年以来,有不少中西先哲对人类社会的终极理念作出了不倦的探索与描述,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这些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令人振奋的精神力量。我国跨世纪的社会发展远景规划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这一终极理念不仅反映了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从而对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起导向作用,而且把社会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社会成员产生一种“认同感”,并由此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文化制度安排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以硅谷与波士顿 128 号公路的文化比较为例

硅谷(Silicon Valley),是美国西岸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旧金山以南的圣克拉拉县(the Santa Clara County)境内的一个长约 70 公里、宽 15 公里的地带。在这一地区除了斯坦福大学以外,还有圣克拉拉大学、州立圣何塞大学等,以及贸易、技术、商业和法律等专科学校,是世界微电子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波士顿 128 号公路是波士顿市的一条高速公路,地处美国东海岸线马萨诸塞州的一个角上,长 90 公里,距市区 16 公里,环绕波士顿呈半圆型,沿公路两侧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型企业,呈线状分布,并与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相连接,简称 128 号公路。20 世纪 70 年代,硅谷和 128 号公路作为世界电子技术的创新引导中心,受到世人的赞誉。它们两者初期的发展具有两点重要的相似之处:依靠大学的研究和国家的军事订货。因此,它们两者常常被人们当作经济发展的典范和总结经验的对象,别的国家和地区都希望通过建立类似的科技园区来复制它们的成功,从而振兴

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近40多年来硅谷和128号公路的发展历程表明,仅仅将高科技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企业集合的群体,仅仅依赖政府的扶持,并不能保证科技园区的持续发展。硅谷和128号公路两个园区的建立,分别起始于各自所在地的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在航天与军事防御方面的科研合同的引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受到冷战需求的刺激,两个地区利用当地的科技优势赢得了大量的军事订货,以电子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硅谷的企业主要从事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生产,128号公路的企业主要从事小型计算机的生产。硅谷经过近30年的不断建设,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半导体工业体系。到1975年该地区的技术型企业已经雇佣100000多名工人,其工程师、电子技术企业、咨询专家的数量以及风险投资和基础设施情况已经可以和128号公路相媲美。与此同时,128号公路地区拥有美国2/3的小型计算机制造商,就业人数达到250000。到70年代末,硅谷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微电子工业基地,而128号公路地区则是美国的小型计算机发展中心,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微电子工业基地。

80年代以后,硅谷芯片的制造商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半导体存储器的市场份额逐渐让位于日本的生产者;128号公路的微型机生产者的顾客开始转移到工作站和个人计算机市场。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美国政府财政的拮据,政府开支和国防预算大幅度减少。在政府和军事订货大量减少以及世界市场竞争的冲击下,这两个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随着危机的到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也开始表现出分道扬镳。在硅谷,新一代的半导体企业和计算机企业在老企业的周围不断创立起来,比如Sun Microsystems公司、Conner Peripherals公司,并取得了成功,像Hewlett-Packard和Intel等老的大企业也开始获得了新的活力,整个硅谷又开始了新的发展势头。而与此同时,在128号公路地区,新创立企业的发展不能补偿像Digital Equipment Corp.公司、Data General公司、Prime公司和王安公司等已有大公司的持续衰退,整个园区的发展呈走下坡路的趋势,1988年到1991年该地区的技术型企业共解雇了60000多名职工。1986年到1990年间硅谷企业的市场价值增加了250亿美元,而128号公路企业的市场价值只增加了10亿美元;1990年硅谷电子产品的出口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约占全美国的1/3,而128号公路只有46亿美元;在1990年全美国增长最快的100家企业中硅谷占有39家,而128号公路只有4家。

为什么这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高技术园区没能保持相似的发展趋势呢?应该说,硅谷与128号公路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并不大,要深入比较二者不同的发展轨迹,更多地要从非正式制度安排尤其是区域性文化制度特征着手。

1. 硅谷的集体创新文化

硅谷文化的核心是集体创新,即利用本地区的集体知识实现创新,创新的目标是求得园区整体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放的环境氛围。企业内部单位之间、企业与企业之

间以及企业与大学、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开放的,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相互学习、帮助,相互交流市场与技术方面的信息,每个企业单位都设法利用本地区所有知识来开拓市场、产品和实际应用;另一方面,企业(包括竞争性企业)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快速扩散和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

(2) 园区的整体发展观。园区管理部门乃至企业、个人的工作立足在围绕本地区整体发展和本地区的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围绕本地区的个别企业;将整个园区的发展看作为企业自身乃至个人发展的先决条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园区形成相互依存的发展关系。

(3) 献身职业的精神。在自主发展思想和园区整体发展观的影响下,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相互信任感和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企业被看作是人们从事工作的工具,如果一个人在一家企业做得不是最好,那么,他就要换一家企业。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这已经被园区社会所认同。在一家企业工作超过2-3年的人并不多见。

(4) 非正式的组织。硅谷的人大多没有当地的背景,是一批远离了家庭和已有社会的年轻工程师,他们在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各样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互相和自由择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对外界来说,茶余饭后是大众相聚闲聊的好时光,可是在硅谷,正是在一个新会场继续参加重要会议的时间,许多新思想、新创意正是在餐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诞生。

(5) 鼓励创业的机制。硅谷文化既鼓励冒险也允许失败。与128号公路的通常由金融专家充当风险资本家不同,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常常本身就是企业家,他们通过自己创立企业然后出卖企业来赚钱。他们帮助买方的投资决策和对购买后企业经营计划、经济战略的咨询,帮助寻找合作伙伴,培训主要经理,担任董事会成员等。本地区的企业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家的创业。

2. 128号公路的个体主义文化

与硅谷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28号公路文化的核心是个体主义。当70年代硅谷的企业正在形成与社会、大学、科研机构之间复杂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的时候,128号公路则盛行着以传统、保密和自我封闭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风气。这种个体主义的园区文化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 坚持传统的生活习惯。尽管128号公路所从事的是技术上先进的领域,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方面以非常保守而著称。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来自新英格兰(New England),毕业于当地院校,他们的社会生活具有英国人的典型色彩,主要是围绕着家庭、教学、学校、网球场等方面,通常在下班后是回家而不是像硅谷人那样聚集在一起聊天,讨论各自对于市场和技术的观点。这种生活方式不能培养出像硅谷那样的职工对于园区和行业的忠诚。

(2) 封闭的企业边界。MI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承担的国防任务比美国的其他大学都多,因此在战后128号公路地区仍然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企业强调保密更甚于合作。

保密的文化使得宝塔形层次式的企业组织结构更加权力集中,信息垂直流动;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单位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机构之间的界限分明,相互之间缺少沟通。

(3) 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保密的需要使得企业力求将上下游活动内部化,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以保护企业的独立性;反过来,保密和提倡对企业的忠诚又左右着企业与顾客、供应商以及与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了本地区个体主义文化的稳定和企业的自我依赖性。

(4) 效忠企业的管理哲学。保守的传统和保密的风气也影响着当地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创业的模式。人们希望自己的企业能稳定发展,因此对企业的忠诚重于创新和冒险。当60-70年代技术人员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硅谷的一种正常现象的时候,128号公路企业主管的哲学主流还在强调职工对企业的“长期”献身。

硅谷和128号公路不同的发展轨迹表明,文化制度安排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硅谷的成功与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集体创新的文化氛围。128号公路的相对失败则是因为其封闭、保守的文化环境。因此,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可能是大的,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保持其持续稳定发展的张力主要取决于内在的文化氛围或文化制度安排。

三、中国经济发展中文化制度安排的缺陷

文化制度安排是影响制度变迁乃至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通常将价值取向的信念伦理置于首要地位的民族来说,它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更为深刻一些。文化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文化的功用在于它是信息载体,在于它所生成的习惯势力,在于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着它所承载的信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中华文化作为影响中国人行为的知识、价值和其他行为因素,通过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了几千年。尽管曾多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对于儒家伦理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却是众所归认的。儒家伦理文化在两千年的中华传统文明的漫长过程中曾起着巨大的作用,拥有显赫辉煌的业绩。但是,勿庸否认,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的许多思想和价值取向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1. 家族化的伦理基础

儒家伦理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以家庭宗族的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儒家曾将人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五常”,这实际上意味着,家庭伦理在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家庭是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及其整个世界活动中的根据地。同时,在中华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是不可分的,是同构的,在儒家伦理看来,家与国,父权与君权,维系血缘家庭的家族家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可以相互感动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明确地表现了这种同构性质。于是,家庭伦理成为立家、立业、立国之本,家庭制度在中国得以久盛不衰。

客观上讲,中国家族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德化人民、传播文明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家族制度过于重视集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人利益及其能动性,不能调动

起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家庭制度天然地对外部世界上有排斥性,不利于技术革新和提高。

2. 人情化的思维方式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人情化的(Personal)、半人情化的(Semi Personal)、非人情化的(Non Personal)的交易。经济史中大部分的交易是人情化的交易,以小量的生产在小地方交易,重复交往,同质的文化价值和没有第三者来强制执行,是这种交易的主要条件。半人情化交易大多发生在长程贸易和不同文化的贸易,亲属关系、设定抵押、交换人或商人的习惯约束了双方,使交易得以进行。非人情化交易是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最主要的方式,订立契约和由第三者(司法系统)来强制执行契约是这种交易方式运作的主要条件。

在儒家伦理中,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为“德治”、“礼治”型,而非“法治化”或“理性化”模式。孔子曾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无耻;道之以礼,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意思是:统治者如果把政刑作为法治手段,被统治者只是被迫服从而不是自觉地接受法治;而以德礼作为法治手段,被统治者会因羞耻之心而自觉接受法治。这种强调德化、强调礼治的伦理思想反映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调整,弱建制;重人治,弱法治。这种人情化的思维方式不利于人们建立起稳定的行为预期和制度预期(表现为财富的挥霍浪费与资本外流等),不适应于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不利于形成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经济体制。

3.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

儒家伦理的价值观念是通过所谓“义利之辩”阐发出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价值理性反对功利理性)便是儒家伦理对义利关系的最佳描述。尽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义利观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在民间社会中却长期形成了一种轻商、贱商的心理潜势。即使在今天,许多从事工商业的个体业主也力戒趋利之嫌,“贾而好儒”、“善举”、“藏富”、“商而优则仕”等现象正反映了这一社会心态。正是这种心理态势对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规模扩张及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严重阻碍作用。

由重义轻利派生出来的,是对于竞争所产生的收入不均及社会不安的反感,即所谓“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种平均主义的价值取向显然不可能调动起经济主体从事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4. 秩序化的理性主义

儒家伦理特别讲究“中庸之道”,其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中庸之道虽有不甘落后的一面,但秩序化的理性主义更普遍地表现为论资排辈、迎合大流。尽管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企业敢于冒险,积极进取,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创新和创业的精神仍未蔚然成风,许多企业仅仅是将创新挂在嘴边而不付诸行动。企业中论资排辈,等级森严,不仅压抑个性,泯灭天赋,扼杀创新精神,而且也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最嫉妨别人“冒尖”、“出头”。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秩序化的理性主义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桎梏。

四、中国经济发展中文化制度的创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代代相传的薪火,不仅仅是种的延续,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延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续的创新,其实质是人文精神的持续创新,是文化的持续创新。只有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世界各民族历史传统中,文化是根本,是其核心,所有的其他因素都因文化而展开,各民族由于所处的环境、空间、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知识经济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复兴民族、超越自我、走向现代化的契机,与之相适应,必须重塑一种新的文化。这种创新的文化,必须是一种古今结合、中西结合的文化;必须是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必须是一种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文化。

1. 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古今结合

诚然,传统的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已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陈旧落后保守的象征。但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不可比拟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充满着智慧与理性。文化制度创新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挖掘传统文化中科学的、合理的、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代化相对接,以期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扎根。儒家文明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价值系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主要内容有:在政治上推崇大一统的国家民族观念,追求大同世界;在人生追求上,强调人对社会、对群体的责任,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在经济上,主张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力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在道德价值上,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主张仁与礼的统一,等等。但是,这种传统文化是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在许多方面与现代化大生产不相适应,迫切需要作出适当调整与创新。如在商品经济中,在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应兼顾个人利益,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应高度重视理性化制度的建设,用“法治”精神完善自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树立正确的“以义谋利”的义利观,效率优先,并兼顾公平;在知识经济扑面而来的今天,应树立能力本位主义观念,高度重视知识和人才。

2. 文化制度创新要注重东西结合

作为东西方两种不同时间与历史发展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同时又有各自的缺陷。这就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贯通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之所以导致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关键在于新教伦理培养出具有个人主义品格的新教徒,从而有助于建立在私人财产制度、竞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在现代条件下,这种西方文化传统也导致了诸如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权利意识等问题,给西方国家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儒家文化在这方面与西方文化有很大不同,它把个人看作是联系着的实体和社会力量,忽

略培养一种有能力且富有进取性的个性化品格。在文化制度创新中,儒家文化可以判断地借鉴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人、以人为本等有益成份,而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中华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美德,但之所以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就是因为这种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弱点是不注重理性化制度的建设,因而不能适应于近代的大规模社会化生产的要求。而西方文化传统尽管存在很多弱点,但恰恰有一点是中华文化所欠缺的,它尊崇和努力探究那种外在于个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显然有利于形成稳定的制度。中国经济要想发展,一定不能夜郎自大,而要尽可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把自己溶于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去,遵循一些国际通行的规则,更加重视理性化、规范化制度的建设。实践证明,近代一切成功的、获得长期稳定发展的华人经济,都发生在海外,发生在对外开放、遵循某些国际通用规则的地区。

3. 文化制度创新必须以培养创新精神为导向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持续的创新才是其不竭的动力。英特尔公司总裁安德鲁·葛洛夫在其新著《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认为,人类正在步入10倍速度比的时代,失败和成功都以10倍速度的变化发生,人们面对的是80%的危机,只有20%的机会,那么如何在这充满挑战的危机中,抓住战略转折点并越过死亡之谷?答案就是“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些“偏执狂”能够大胆创新,主动应变,永不懈怠,并充满忧患意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我国必须在全社会培养一种创新精神,必须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秩序理性,树立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科学理性和文化氛围。在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一方面,对那些被尊重的对象来说,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与幸福感,更大程度地激起他们的进取心与创造欲;而另一方面,世人受到这方面的感染与启迪,也会在社会中形成一股热爱知识、追求知识、崇尚知识的潮流。

注释:

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载《经济研究》,1992(5)。

刘洪等:《影响科技园区持续发展的因素分析》,载《中国软科学》,1999(1)。

孔泾源:《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载《经济研究》,1992(7)。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不少私营企业家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争先成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便是这种社会心态的现实写照。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1992。

比如日本的工程师与律师的比率是7:1,而美国却正好相反为1:7。

樊纲:《渐进改革的经济学分析》,246~247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武汉 430072)

中南民族学院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金萍)